

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
甘肃

针灸委员会



赠阅

09
2

样 本 库

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 甘肃分会 针灸委员会 编

主编： 曲祖贻 张涛清

编辑按姓名笔划为序

- 编辑： 马明非 甘肃省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叶廷珖 兰州医学院副教授
曲祖贻 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副主任医师
刘 福 甘肃省中医学校针灸教研组组长
张涛清 甘肃省中医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杨廉德 甘肃省中医学院副主任医师
- 特约编辑： 魏明安 兰州大学中文系讲师
- 审阅： 张涛清 甘肃省针灸委员会主任委员
曲祖贻 甘肃省针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孝明 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115050

前 言

为了纪念我国著名针灸学家皇甫谧，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甘肃分会针灸委员会，受甘肃省卫生厅委托，决定于1981年冬编写《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会议推选张涛清、曲祖贻、叶廷光、杨廉德、马明非、刘福等同志任编辑，并特约兰州大学魏明安同志为文史撰稿人。

全书共分如下五部分：

一、皇甫谧生平述略：部分史料与传说；

二、灵台遗迹：甘肃省针灸委员会赴灵台县皇甫谧史迹调查记；

三、晋代学者皇甫谧：由兰州大学魏明安老师执笔，介绍皇甫谧的生平、时代，《高士传》，《帝王世纪》，及有关重要文史资料；

四、皇甫谧在医学上的贡献：简述《针灸甲乙经》的学术价值及在国内外的影响；

五、《针灸甲乙经提要》共十二卷，其中以3～4卷和11～12卷为俞穴治疗篇，作重点介绍。

本书有史料，传说，遗迹及针灸医学资料等，可供有关科研、教学与临床参考，及关心祖国历史的同志一阅。

皇甫谧是一位博学多才学者，在文学，史学，医学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最卓越的贡献在于撰写《针灸甲乙经》。这本书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是继《内经》之后针灸医学的

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第一次把针灸学专门化，系统化，成为后世学习针灸和医疗实践的重要指南。

《甲乙经》不仅推动了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而且对国外针灸研究的影响，也甚为巨大。

皇甫谧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也是我省的莫大光荣，因此，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

由于编者都有教学和临床任务，大家于业余短时间内仓促写成，接受分题编写时，可能有遗误和重复，请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将来补充修改之。

1981年夏，我会曲祖贻、张应泰二同志，不顾酷暑，亲赴灵台，白日采访，夜间查阅资料，短短十余日，胜利完成调查工作。还有甘肃省中医学校秦尚文同志，宁幼珍同志，平凉地区文化馆刘玉林同志，灵台县文化馆刘得祯同志，以及灵台县委领导同志，对本工作曾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甘肃分会
针 灸 委 员 会

1982年5月30日

目 录

皇甫谧生平述略	(1)
一、家庭和时代的影响.....	(1)
二、自学成才.....	(3)
三、隐居不仕.....	(5)
四、轻视权贵.....	(7)
五、《针灸甲乙经》刊行.....	(8)
六、错服“寒石散”.....	(9)
七、奖掖后进.....	(10)
八、矫俗薄葬.....	(11)
参考文献.....	(12)
灵台遗迹	(15)
一、皇甫谧之墓.....	(16)
二、皇家萍与皇家花园.....	(16)
三、皇甫谧的读书台.....	(17)
皇甫谧在医学上的贡献	(18)
一、撰写《针灸甲乙经》.....	(18)
二、《甲乙经》对国内外的影响.....	(18)
三、《甲乙经》的学术价值.....	(20)
晋代学者皇甫谧	(25)
一、生平、时代.....	(25)
二、皇甫谧《高士传》初探.....	(29)

三、《高士传》的成就·····	(47)
四、《帝王世纪》在整理辑存古史时保存了丰富的 神话传说·····	(53)
参考文献·····	(57)
《针灸甲乙经提要》(128篇篇目从略)·····	(66)
卷之一~卷之二·····	(74)
卷之三~卷之四·····	(80)
卷之五~卷之六·····	(101)
卷之七~卷之八·····	(120)
卷之九~卷之十·····	(137)
卷之十一~卷之十二·····	(150)
参考文献·····	(169)

皇甫谧生平述略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①，晚年自号玄晏先生^②，安定朝那^③（今甘肃灵台县）人，是我国晋代著名的针灸学家。他生于公元215年（东汉建安20年），卒于公元282年（晋太康3年）^④，享年68岁，为发展我国的针灸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在文学和史学上也有着极其光辉的成就。

家庭和时代的影响

皇甫谧是东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⑤。但其祖和父仅为小吏。他从小过继叔父，随之迁居新安^⑥（今河南浞池县）。40岁时因丧后母才又回到故乡朝那^⑦。他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年青时还自己耕种过田地。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因此，他对劳动人民有真实的了解和同情。

皇甫谧在他二十岁时还不喜欢读书，整天无节制地游荡，人们还以为他是个傻子。《晋书》里这样记载，他“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⑧。”

公元234年（汉建兴十二年），皇甫谧二十岁，他诚恳地把得到的瓜果奉送给养育自己成人的后叔母任氏。皇甫谧的温顺举动不仅未使后叔母快慰，反而使她十分难过，使她疚心地感到自己对皇甫谧没有尽到应尽的教育责任。他对皇甫谧说：“孝经上说：‘用牛、羊、猪三牲供养，还算不孝。’你今年二十有余，忘却礼义之教，不想正道，怎能使我心安

呢？”继之，又感叹地说：“过去孟子的母亲三次搬家而成就了儿子的事业，曾子杀猪教育了儿子，难道是我没有选择好邻居，或者教育上有什么缺失吗？你为什么这样的迟钝不懂事呢？端正品行，深研学问，你自己得益，于我有什么好处呢？”后叔母因此伤心地哭了，皇甫谧亦深受感动。从此他就在家乡拜席坦为师^⑨，刻苦学习。因迫于家贫，只好“带经而农”^⑩，即一面务农，一面学习。可见他的成长与后叔母的教导有密切关系；而他的学习条件却是很艰苦的。

皇甫谧生于汉末，长于曹魏，死于西晋。他的一生，经历了社会、政治局面的三次大变化。每次都是新的封建统治代替旧的封建统治。

东汉末年，战争不断，兵戈扰攘，天下离乱，造成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加之疾疫流行，民弃农业，流亡逃窜者横尸遍野。皇甫谧目睹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饱尝了频繁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他后来在《帝王世纪》一书中曾愤怒地写道：“汉末之乱，郭汜、李傕之属，残害又甚，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下奔流，白骨盈野，故陕津之难，以箕撮指，安邑之东，后囊不完，遂有寇戍，雄雌未定，割据庶民，三十余年……人众之损，万有一存^⑪。”由此可见，他对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而挑起的长期战争罪行是深恶痛绝的；对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深表同情的。这对他矢志于学，隐居不仕，以及把毕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救死扶伤的医学事业上的高贵品质的形成有很重要的意义。

西晋统治集团的腐化残暴和荒淫奢侈，在我国的历史上是颇为有名的。晋武帝本人就是奢侈的提倡者。王恺和石崇斗奢侈，晋武帝助王恺，仍不能取胜。一个皇帝助臣下斗奢

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就连当政的大官傅咸都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⑫。”当时的一般士大夫，必然会受到这种淫邪风气的影响，因而史书上有“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响应^⑬”的记载。他们群起而争的是钱财和做官，贪图的是享受与挥霍。谁要真心做事，谁就会遭受斥责和轻蔑。而那些愤世嫉俗，敢于批评朝政的士大夫，则会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如嵇康就因攻击礼法之士和儒家的六经，以及在给山涛的信里表示反对司马氏集团而被司马昭所杀^⑭。所以这些人就尽量采取不同的方式来逃避政治：有的不愿做官，隐居不出，如向秀“灌园锻铁，隐居不仕^⑮”；有的游山玩水，寻找世外桃源；有的举杯痛饮，以酒消愁，如阮籍的侄子阮咸曾经用大盆盛酒，有一群猪来饮酒，他便和猪共饮^⑯。还有一些官僚名士，则醉心于清谈。皇甫谧生长在这样的时代，处于这种恶劣气氛的包围之中，但他既没有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也没有消极沉沦，而是超凡脱俗，奋志于学，在医、文、史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甚至在身患重病之后还努力著述，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就是在患病之后撰写的。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一生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操和奋发有为的精神，正如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一样，也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自学成才

皇甫谧自从拜乡人席坦为师之后，一直“勤力不怠^⑰”，甚至达到了“耽耽典籍，忘寝与食^⑱”的程度，以至当时的人对此称之为‘书淫’^⑲。在他42岁时得了半身不遂的风痹症后，他“犹手不辍卷”和“披阅不怠^⑳”。有人劝他不要

过分看书，以免损耗精神，他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②！”为了学习和事业，他真是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学什么？以及为什么而学，这是皇甫谧在前进的道路上必须解决的问题。

东汉末年，战争频繁，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佛教和道教因此盛行起来。到了魏晋，丹鼎符篆，服药求仙，肉体飞升等一系列骗人的鬼话广为流传。而且由于何晏、王弼、阮籍等所谓名士的提倡，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唯心主义玄学体系，以至“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③。”但皇甫谧“与流俗异趣^④”，“博综典籍百家之言^⑤”，在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方面尤为专注，这说明他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即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升官发财，而是对世人有所裨益。

皇甫谧的生活经历是比较单纯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甘肃故乡度过的，但也去过河南、陕西和成都。当时社会上的读书人在其青年时往往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漫游时期，以便到人文荟萃的都市，用语言或诗文作自我宣传，结交权贵，求其援引，在他们的幕府里求得一官半职，为自己的前途找出路。而皇甫谧漫游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访贤求道，得到学问。他离开故里而欣赏到了异乡的山水与新奇事物，看到了人间的悲欢离合，遇到了一些快乐与不幸。他把所见所闻及体会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并感到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这种漫游使他丰富了生活，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积累了经验。

通过多方面的刻苦学习，皇甫谧医、文、史并茂，名噪

一时，并成为千古学者。其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②，及《针灸甲乙经》等。

隐 居 不 仕

前面曾经谈到，在皇甫谧所处的时代，升官、贪财、享受是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是一般士人争相追求的目标。以皇甫谧的人品，他的才学，他在社会上的名望，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以及他的一些官僚社会关系，如他的某些门人是西晋名臣，他姑母的儿子梁柳是太守^③，他要当官是很容易的。事实上，当时曾有很多人建议他出来做官，一些政治显要推举他做官，甚至皇帝本人也一再下令要他做官，他都一一谢绝了。

当有人劝他扩大交往，博取名望时，他说：“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④”人们看到他贫病交迫，就婉言劝他改变一下处境，对他说：“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贍，转死沟壑，其谁知乎？”他却回答说：“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⑤”。魏郡羡慕他的学识和品德，推举他做孝廉，他谢绝了。景元元年（公元260年），皇甫谧46岁，相国晋王召选皇甫谧等37人，“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唯皇甫谧托病不出^⑥。

太始三年，皇甫谧48岁，“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可是他又以病上疏：“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③①}”予以推却。因言辞恳切，晋武帝准其所奏。一年后（即晋太始四年），他49岁，又被“举贤良方正”，也没有去。却给皇帝上表借书，皇上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的美德，“送一车书与之^{③②}”。咸宁初年，皇甫谧61岁，皇帝又下诏说：“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他也以病重为由，坚决拒绝了。皇帝起初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后来又“诏征为议郎”，“召补著作郎^{③③}”。以及“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③④}”。他都没有答应。

皇甫谧既不同于司马氏集团中人“见利必夺，以杀助夺”，也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士人在侈谈清高的后面招权纳货，而是坚决拒绝出来做官，这原因究竟何在？

从他所写的《帝王世纪》^{③⑤}、《玄守论》^{③⑥}、《释劝论》^{③⑦}、《笃终论》^{③⑧}等著作所表达的处世观点和他的终生为人来看，他之所以稳居不仕，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对极端黑暗的政治的反感，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安贫乐道的高尚情操。所谓安贫，就是甘愿过清贫的生活；所谓乐道，就是扎扎实实地搞学问，特别是力求在医道上有所成就，以造福于世人。他“躬身稼穡，带经而农^{③⑨}”，从小与劳动群众在一起，他们对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包括病痛，是深有了解的，况且他自己身患重疾，他对人民的痛苦的体会就会更深。皇甫谧在乐道上的可贵处在于他的志向极其坚定，他始终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奋斗着，贫穷时如此，身患重病时如此，有了名望后如此，在利

诱和高压下也是如此，真个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他同时代的所谓“竹林七贤^⑧”如山涛，阮籍，向秀等人，在重压和利诱下都先后投靠了司马氏，当了大官。这的确是鲜明的对比。

此外，皇甫谧的隐居不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司马氏集团的残酷杀夺怀有极其畏惧的心理，采取了不问政事、明哲保身的态度。我们知道，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士族门阀集团是靠杀夺起家的，它的统治是极其贪婪残暴的，连统治阶级内部的王公贵族都常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惧心情，何况是多病的皇甫谧。“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⑨”。对皇甫谧来说，前车之鉴，是不会不吸取的。《汉晋春秋》曾有皇甫谧在正始九年冬梦到“诛大将军曹爽^⑩”的生动记载，而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则是发生在正始十年。魏明安老师在本集《晋代学者皇甫谧》一文中对此作了合乎逻辑的分析。把《曹人之梦》作为解释皇甫谧畏惧朝政，隐居不仕的佐证，看来是合乎情理的。

隐居不仕固然只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也反映了皇甫谧对富贵、利禄和官场的轻蔑。

轻视权贵

皇甫谧姑母的儿子梁柳被朝廷命为城阳太守，将要赴任，人们劝皇甫谧为之饯行，他回答说：“梁柳未当官到我家来，我迎送他时门都不出，吃饭只不过是一点咸菜，穷人认为吃酒肉就是朋友。今天他当郡守了，我就为他饯行，那是看重城阳太守而轻视梁柳，不符合古人之道，我心中也不安^⑪”。多么高尚的品质，赤诚的心！

《针灸甲乙经》刊行

皇甫谧40岁时，后母去世，叔父的儿子也已成年，他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时，皇甫谧在文、史上已很有成就，正处于有所作为的中年时期，但不幸在他42岁（魏甘露元年）时，突然患了风痹症，半身不遂，兼苦耳聋^③。这对他的精神和肉体都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疾病的痛苦，使他深感医学事业的重要。他说：“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④他对黄帝、岐伯、扁鹊、医和、仓公、华佗、仲景这些历代名医，深为敬佩，“徒恨生不逢乎若人”。他决心把自己有生之年的全部精力贡献给针灸事业。习览经方，手不释卷。他还动员儿子皇甫方回和门人一起从事医疗经验的总结，并在自己身上体验针感。同时不遗余力，抱病整理医学古籍和撰书，终于写成了《针灸甲乙经》这部光辉的针灸巨著。

《针灸甲乙经》全书共12卷，分128篇，刊行于晋太康三年。关于它的主要内容，后有专文介绍，在此不再重述。它的撰成，除了皇甫谧本人的智慧和努力之外，还有着很重要的历史原因。即在秦汉时期，我国的生产和科学（包括医学）已经有了相当基础；在魏晋时期，虽然相对稳定的时间很短，但我国的生产和科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在数学、医学、和农学等部门还有一些突出的成就。在原有的基础上把我国的医药学向前推进了一步的医药学家王叔和、葛洪等也是生于这一时期。可以说，《针灸甲乙经》是历史前进的产物，从它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结合。

《黄帝内经》是皇甫谧撰写《针灸甲乙经》的主要参考资料，成书约在战国时期，可能在西汉时又作过一些补充。本书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基础理论、辨证施治规律、病症等多方面内容，特别是其中的《针经》部分，更详细地记载了经络和针灸方面的成就。说明在晋代以前我国的医学和针灸学已有相当的基础。

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刘胜墓是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埋葬的古墓，其中有一批精细的医药用具，特别是“金制、银制医针九根”^④完好如新，足以说明早在西汉我国的制医针的工艺就已达很高水平。

皇甫谧正是总结了魏晋以前的针灸学成就，吸收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才写成《针灸甲乙经》的。由于上述三部参考著作“文多重复，错互非一，”^④他作了十分繁重的“使内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④的选材整理工作。尤为可贵的是，他师古不泥，对前人的理论取舍有度，在制方用穴上还有许多创新，使我国的针灸学在《内经》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针灸甲乙经》的刊行，标志着我国针灸学的又一次重大发展，使针灸学第一次专门化、系统化起来，奠定了针灸专科化的基础。《甲乙经》从刊行到现在已近一千七百余年来，它不仅推动了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而且对国外的针灸学也有着甚为巨大的影响。

错服“寒石散”

景元二年，皇甫谧47岁，由于疾病的折磨和时代的影响，

他也卷入了帝王将相们腐朽的“服石”之风，以求挽救“躯半不仁”的身体。

服石的起源很早，《史记·仓公列传》就有“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的记载，而且引扁鹊“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④的说法为理论根据。可见在战国或至少在西汉时就有了服石的方法，不过当时服石只是作为一种治疗的方法而已。魏晋时期，崇尚道家，迷信盛行，炼丹、服石已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追求长生不死、返老还童的手段，因而形成了风气。

所谓“服石”，就是长期服用一种石性药方，此方包括五种药物，即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和赤石脂，所以叫“五石散”。又因服后身体烦热，必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所以又叫“寒食散”。五石烧炼后大热有毒。服后药力发作时，狂躁烦热，坐卧不宁，叫“石发”或“散发”。以致发展到神志颠狂，宽衣大帽，到处乱跑，叫“行散”。最后发展到“隆冬裸袒食冰”^⑤，或用冰水浇身。其中毒者，有的舌缩入喉，有的痈疮陷背，有的脊肉溃烂。

皇甫谧服石后，他如得一场大病，“初服寒石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⑥痛苦难忍，竟因此而“叩刃欲自杀”^⑦，终因劝阻乃止。后来，他从自己服石中毒的经验中，现身说法，抨击了服石之弊。

奖掖后进。

魏晋士大夫图虚名、讲标榜的风气盛极一时，后进之士得不到名流的吹捧、提拔、往往无人重视，甚至遭受排挤。

左思是西晋时期较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博采材料，聚实事物”，积十年之久才写成《三都赋》^⑨。此赋辞藻壮丽，气魄雄伟，所记事物大体真实，是西晋赋中的杰作。但由于左思出身寒微，政治上受门阀大族的压抑，因此《三都赋》问世之初，时人多予以讥评。左思虚心地向皇甫谧代为斧正，皇甫谧阅读后，十分赞赏，并为作序。这之后，从前讥评左思的人，不但不再讥评，反而对他很佩服，大家争相抄录《三都赋》，以至当时连纸价都贵了起来，留下了“洛阳纸贵的佳话。

矫俗薄葬

皇甫谧一生饱经忧患，抱病撰著，用尽了心血。晋太康三年，皇甫谧的身体愈来愈衰弱了，几乎是百病俱发。他已预感到自己寿命不长，于是写成了《笃终论》一文，主张矫俗薄葬。他在临终前，还嘱咐后人，他死后要穿平常随身的衣服，用芦席裹尸，择不毛之地，挖一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宽六尺的土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⑩”坟地周围不种树木，“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⑪”。“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槨，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衣，殓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于坑，以身亲土，……。”^⑫生不为人所知，”死要“亡不损生”。矫俗薄葬，再一次体现了皇甫谧安贫乐道的崇高品质。这个把事业看得十分重要而把荣华看得十分平淡的一代学者，终于在穷困潦倒中病逝于朝那，享年68岁。其子皇甫童灵、皇甫方回，“遵其遗命^⑬”，将父俭礼薄葬于灵台县张敖坡塬边。千余年来，当地人们世代相传，称其墓为“皇甫古墓”。